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三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〇〇期 ——
（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5a）

【书刊评论】	“事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 马笑东的口述史《动荡的青春》	董之林
【峥嵘岁月】	第一次经历暴力	叶维丽
【抗拒遗忘】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敏
【往事追忆】	妻子也进了“牛棚”	戴维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事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马笑东的口述史《动荡的青春》

• 董之林 •

《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现代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1949年后，在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有没有日常生活？如果有，能不能产生新的民俗传统？产生一种新旧杂陈的生活方式？激进的社会形态，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提供了哪些不可忽视的要素，并潜伏在意识形态的底层，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影响至今？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口述史显示出撰写者看待历史的独到之处。如该书“前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同时，她彰显了一种学术立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

（一）

“目前发生的改变过去发生的事——至少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我这里引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话，并不是说，参加过“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撰写者，在冷战结束后，试图改写自己的过去，对那一代人历史上的失误文过饰非；而是想说，撰稿者之所以写这本书，与她在海外生活多年，特别是“目前发生的事”有重要的关系。叶维丽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关于这本书的缘起，她书中有明确说法：

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由此，她和马笑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约定，以口述史的形式，回应那一段已经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历史，也是有关她们个人的成长史。经数年努力，在马笑东因病无法继续之后，叶维丽作为统一撰稿人，这部口述史于2007年最终完成。

如果由于上述叶维丽“质疑西方某些人”的话，就以为这是一部为了反驳冷战思维，给五六十年代生活大唱赞歌的历史书籍，那么读过之后，无疑会让习惯于单向思维的读者感到失望。关于“文革”中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市委干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惶惑、但求自保而表现的冷漠；单位的造反派可以随便查抄所谓“走资派”子女的日记，捏造罪名，并偷偷放进孩子个人的档案，等等。这些事件通过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一五一十地展示出来，无不令人发指、胆寒。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部“伤痕文学”似的历史。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反驳冷战思维的方式，不是那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不是那种“全民共忏悔”的方式。经过某种严格的史学训练，作者摆脱了以往有关“文革”叙事的框架，尽可能摒弃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当然，这里并不缺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口述者对细节的重视，使得那些事件，就像是由大量日常生活元素汇聚而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中个人责任是无法回避的，也经过她们认真的核对和深刻反省。但“个人”和“个人行为”并不是被虚拟出来的神话，而是经由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被某种文化或不同文化的冲突“塑造出来的”，从而具有普遍价值。

口述史的风格一如两个女人聊天，你来我往，明快而畅达，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但其中包含的历史因果关系，却异常复杂。善恶、美丑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往往因既是果，果也是因。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社会发展到今天，那些特殊时代的文化因子，没有随时代变迁而宣告“终结”；它们像一股暗流，仍悄然作用于当下现实。

（二）

细节有一种深刻的力量，使宏大的历史产生亲和力，透出真实可感的光泽。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对已经“圆满的历史”横生枝节，对原有的观念是一种耗散和消解。但正是这种消解、而不是毅然决然地背叛过程中，因其“宏大”而显得大而无当的观念，却因经过细节化和个性

化的处理，变得令人刻骨铭心。比如口述者的父辈，青年时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由追求社会公正，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博爱，到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知识阶层十分普遍。但是他们这种经历，又与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苦大仇深的工农阶级才是革命中坚力量，有很大区别。这使得父辈人由原来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开始，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备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抚今追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懊悔青年时代的选择。

关于这一点，叶维丽是从她爷爷那一辈人的生活说起。她的爷爷早年弃官经商，由安徽至天津做银行总经理，同时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职，“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但他家里的生活完全是“封建主义的”：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得我爷爷的宠爱……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

我奶奶在去世前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上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我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叶维丽的众多叔伯属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上层，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生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不解之缘，追溯起来，也都有反抗旧式家庭的背景渊源：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关于解救劳苦大众，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认识：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父母都是“三八式”（抗战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家庭背景不同，投身革命的动因也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局中，他们都是觉悟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铲除“社会的不公”，才能结束国家的满目疮痍，实现平等、博爱和公正的理想。马笑东的父亲原在山东老家当教员：

我父亲抗战前读的书里，有鲁迅的杂文，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对我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问过他为什么抗战爆发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太腐败。”他举了一个当时老百姓讽刺当官的巧取豪夺的顺口溜为例：“省长刀子刮，县长剃刀刮，乡长老爷算子算。”

从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她们的家庭也随之列入当初革命目标所指的社会上层。当小学生马笑东第一次走出商业部宿舍大院，到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同学家串门，发现这位平民子弟一家住的房子那么低矮、阴暗，十一二岁和她同龄的孩子，要担负做饭、照顾弟弟妹妹、洗衣服等诸多家务，她感到非常震惊。和这些同学朝夕相处，她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却还有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如何继承父辈传统，实现社会普遍的理想教育？

为调整这种生活的反差，她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学习、工作、劳动事事争先；二是压制自己的欲望，选择一种近于“苦行”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从她上小学五点钟起床做班级值日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到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云南农场劳动，来例假从不休息，照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干活，同伴还以为她从来例假。她做这一切，没有丝毫的伪饰和做作，也是伪饰和做作装不出来的。马笑东把“革命”确立为一种信念，而不是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指向，因此，在她的青春辞典上，像《牛虻》中的亚瑟那样“吃苦而不诉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那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遗产，都向“革命”的聚光点汇集，形成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似乎都在为“革命”作准备。为了有意磨练自己的意志，她放弃了许多几乎不带任何奢侈色彩的人生享受，自然也摒弃了温情和儿女情长。

尽管“革命”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但那种在信念中生活的意志力却成全了她们。马笑东和叶维丽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别到云南农场和山西农村，像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工和农民那样生活了五年，五年之后，她们分别重返城市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又先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她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特别是马笑东的经历，那种不让须眉，在人生困难面前不颓唐、不退缩的言行举止，为老中国“灰色的”人性画布，留下醒目而富于震撼力的一笔。

（三）

比较的方法，也是这部口述史鲜明的特色。与马笑东相比，叶维丽对“革命”的思考更复杂，所以当她们面临同一类问题，解决的方案，以及阐释的角度也十分不同。例如，两个人都出身于共产党的干部家庭，但叶维丽的直系亲属中，她的舅舅、叔伯中有好几位都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在讲究出身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这种家庭背景使她在幼小的年龄，对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份谨慎和敏感。与性格直率、举止果敢的马笑东相比，她更“善于思”，而不那么“敏于行”。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人生阴影（包括“文革”抄家抄走了她习画的裸体素描和日记，并作为“思想不健康”“有问题”的凭证，塞进她个人档案，影响了升学），并没有使叶维丽一蹶不振，尽管也有阶段性的迷茫与消沉，但并不影响她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教师，并为出国深造打下良好基础。口述中，她受挫折，却能依旧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原因可概括为三点：“大院生活”、“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母亲—女性经验”。

关于1949年以后的生活，留给叶维丽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大院文化”。叶维丽的父母在新华社工作，他们住的也是新华社的宿舍大院。

“大院”是共产党进城后，安置干部生活的一种方式。“大院”改变了老北京城原来独门独院的生活格局，而且由于“大院”以单位或部委划分，与城市平民的大杂院也十分不同。北京

至今还有许多单位，延续着“大院”的居住方式。但据叶维丽观察，那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已经“淡多了”。新华社大院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佟麟阁路，占地面积大约七十亩。民国时期，这里是国会所在地，有国会礼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所在地。马笑东虽然住的是商业部大院，但从她们二位的口述经历看，无论占地面积，物质环境，还有大院的福利设施，商业部大院都不及新华社大院。

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没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五十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

在回忆这一段生活的文字旁边，是新华社大院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的合影，冬季，大部分人都穿着大衣和羽绒服，连站带坐，层层叠叠地有三四十人。对此，叶维丽颇有感情地说：人“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的生活，有点儿像现代社区的早期模型。尽管它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当时北京平民的生活相比，十分特殊化，甚至还带着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痕迹，但生活设施的周到妥贴，邻里之间相互往来，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学会在群体中与人和睦相处，都是现代社区生活一些必备的功能。特别是新华社大院还有图书馆可以借书，使叶维丽和她的伙伴读到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机关不准小孩再去图书馆借书，叶维丽还和她的小伙伴一起贴“大字报”，抗议大人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力，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那也是一种“资源共享”的权力。

叶维丽没有把大院文化演绎成一种纯自然现象，“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决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因为“文革”前后，一些部委和军队大院都住着“通天人物”，或者和中央高层有更多直接接触的干部。大人们关于斗争进退的把握，往往最先由他们的子女从“大院”散布到学校，然后才是社会。书中列举的几个“文革”中学生早期领袖和红卫兵代表人物，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关于这种集体生活的大院文化方式，是不是导致红卫兵现象的主要原因？比如，叶维丽本人，还有她的许多朋友就不是“红卫兵的中坚”。除了父母先后受冲击、“家庭出身”的困境外，新华社大院生活良好的阅读条件，相对丰富的国内外信息给予人的开阔的心境，以及长期共同生活中人与人、特别是小朋友之间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也是她和许多大院子女无法成为“红卫兵的中坚”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拿捏不定的结论，口述中矛盾的现象，叶维丽都先不急做价值判断，为的是把矛盾各方充分揭示出来，留一份历史存照。

（四）

如果说，写历史也须使用修辞手段，讲一系列有来龙去脉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文学重要的区别，在于撰史者不能凭借个人的主观好恶，或社会接受的流行趋势，对历史事件进行虚

构，或随意取舍。口述史的矛盾状态恰恰说明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正与负、负与正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历史成为有机的生命体。

她们对幼儿园和小学的生活，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在幼儿园每天就是做游戏、听故事，小学生活一个醒目的标题是“饭桌旁的家庭”，但这些与政治教育几乎是同时的，当时还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先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使人终身受益。

这样的文字隐含着不安。当政治宣传超出少年儿童的人生经验所能理解的范围，而被灌输并确立为一种人生信条，其中的盲目性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回避。关于这一点，叶维丽依然从细小的生活情景入手，见微知著地予以揭示。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 1966 年 8 月 5 日被学生打死的事件，是“文革”给叶维丽“刺激最深的”，当她详细讲述了那个残暴、血腥的暴力事件之后，也有一段后来她访问一些当时在场者感受的纪录（第 115 页）。紧接着话锋一转，她说起与“我父母认识”的这位“卞阿姨”1966 年春天的一件事。叶维丽和母亲在百货大楼碰到卞仲耘，“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叶维丽那年 16 岁，她的惊讶，不仅“嫁妆”这个词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陌生的名词”，主要在于“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尽管围巾在当时价格不菲，她的母亲还是买下来，压在“箱底”多年后，“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也就是说，卞仲耘当时完全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就被叶维丽的同学、那些像自己女儿一般的中学生活活地打死。在一段血腥的，又一段充满温情和感伤的记忆对比下，强烈的反差色彩使人不能不仔细回味这个细节的深意。像北师大女附中这样一个全国闻名、教育质量上乘的女校培养出的女学生，在花季一样的年龄，怎么会亲手打死自己的师长？这是长期以来，叶维丽内心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她最终的结论否定了“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倾向，以及“压迫深重，反抗越加激烈”的种种解释。叶维丽认为：“‘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工作组撤销后，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很多人急于证明，我们是有能力自己‘干革命’的。”恰恰在这一点上，叶维丽相当委婉地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时的学校领导和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可怕的后果，“文革”开始首先降临到她们头上。在此之前，她还说到学校另一位校领导在“文革”开始前，专门把学校所谓“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女召集起来，作“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动员报告，这样的报告实际上是“文革”初期“血统论”、红卫兵运动的前奏曲。叶维丽完全没有追究个人的意思，而是突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对于一场人为的灾难，个人反思具有的深刻意义。

由此，更看出叶维丽和马笑东成长经历的复杂和多元。与大院文化、学校教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母亲的影响和女性经验，这也是口述史一个重要层面。叶维丽通过母亲的经历，主要表示这种看法：“革命”、“事业”这些辉煌的字眼，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抹煞女性的牺牲和奉献，特别是在革命历史教育中，只有战斗中负伤和牺牲的女性才值得褒扬，如果由于女性特殊原因，比如生育、病痛、为追随部队不得已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她们遭受的痛苦和打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计在那“光荣史”上。马笑东的外祖母早年被出国留学的外祖父遗弃，随

即抑郁而终，嗷嗷待哺的母亲由她舅父抚养成人。虽然外祖父一直供给母亲生活费和教育费，但母亲致死不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不能原谅他的过失。后来还是孙儿辈的马笑东对外祖父多了一些理解。九十年代，她去云南曾专门打探早已过世的外祖父情况。从父亲留给她母亲的遗物中，马笑东得知外祖父“文革”中写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还惦念他外孙辈受教育的情况。口述史中，她以他们兄妹骄人的学习成绩，告慰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外祖父，告慰那个内疚而满怀期待的灵魂。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母亲出身经历都不同，但口述对于其中的女性经验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像她们对彼此经历上的认识有诸多差异。认识的共同点在于，她们的母亲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代有志向，也有作为的职业女性，她们面对挫折、事变和痛苦表现出的韧性与顽强，也都使女儿们感佩不已。更主要的是，口述史通过母亲的命运，看到今天与叶维丽奶奶向大太太哀求死后穿红裙子的时代相比，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坏的东西在变，好的东西也在变。但是作为女人，要想改变女性的命运和历史，仍须自强。也就是叶维丽母亲常说的，做女人，要争气。口述史中，用马笑东的话说，“谁说女子不如男”，永远“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用叶维丽的话说，必须“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对于《动荡的青春》，美国历史学家柯文说：“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除此之外，我想，历史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2008年9月8日，完稿于北京

~~~~~

## 【峥嵘岁月】

### 第一次经历暴力

• 叶维丽 •

（本文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叶维丽：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66年7月份。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这是本能的反应。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别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号的事。

马笑冬：我们后来都听说了，这在北京市中学是件大事。

叶维丽：这是“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案子。后来1966年八月被视为“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厅的一对夫妇，也在八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两天。卞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打死人的时间在八月初，这个时刻本身有没有名堂？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想这些问题。

7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在河北邢台军训，家庭出身很“不好”或政治上“有问题”的同学不让去，留在北京劳动。骨干学生也留在北京，她们的任务是搞运动，参与为校领导和老师划线分类。老师们都没去军训，留下来人人过关做检查。我们学校因为是“修正主义宝塔尖儿”，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主要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一类。这种做法很能反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方式：“反右”（批“反动学生”）加“四清”。给干部分类和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在我们学校她们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就像四清的做法。

马笑冬：你在哪儿？

叶维丽：我去邢台了。当时说要军训一个月，结果一个星期就戛然而止，通知我们立即返京，那应该是“八一”左右。本来部队和我们有个“八一”联欢会，结果变成了欢送会。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坐上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从车站步行回学校，一进校园就听说工作组撤了。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胖胖的工作组女副组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愕。从第一次校领导靠边站到第二次撤销工作组，在短短的二月里权威两次倒台。虽说这是第二次，但冲击力绝不比第一次小。此后学校就没有权威了，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面。

后来知道，在我们离京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毛泽东7月18号从南方返回北京，7月24号决定撤工作组，7月29号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会上毛泽东出人预料地从后台出来，走到前台。这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也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毛就从“二线”返回“一线”，集文革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为一身。我认为现在研究文革，对七月下旬八月上中旬这一段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文革“再次发动时期”。我对这个时间段这么感兴趣，是想更好地了解我们校长之死的个案和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关系。

毛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成规打破了。打破之后呢，你就发现上层混乱之极，混乱到刘邓都不讳言他们不知所措了，李雪峰、吴德回忆录也都表述不知文革该怎么搞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做法是刚才说过的“反右”加“四清”，这一套给后来红卫兵造反提供了初始的动力。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是被压制的，清华蒯大富、北大附中红旗，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都遭到工作组压制。

刘邓后来成了文革受害者，官方文革史对这一时期刘邓的压迫性谈的不够。通过他们的孩子，刘少奇在师大一附中、邓小平在师大女附中整反动学生，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当然，要强调的是刘邓工作组时期暴力是有“度”的，有没有度还是很不一样。6月中旬北大学生批斗黑帮曾经出现过暴力，刘少奇针对这件事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反对“乱斗”。我们学校在工作组期间批斗过一次卞仲耘，那次她就挨打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次批斗会没有印象。后来听说卞还写信向上申诉，那时候她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到八月份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任人宰割了。而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具有其它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一上来先对巴格达狂轰滥炸，此举被称作“shock and awe”。暴力在“文革”这个阶段也有类似的作用。

伴随着毛从后台走上前台，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毛与青少年学生之间的互动，像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党团组织之外独立学生组织的出现。这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成立了就是“反革命小集团”。这又破了共产党的成规。就是在这前后“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而江青等人对这种情况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管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叫“小太阳”，还说中央文革和这些“革命小将”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下子把这些孩子捧得这么高，他们不忘乎所以才怪。

对联的出现使学生群体公开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人上人，天然的革命者。很多人曾经遗憾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现在他们认为“轮到我們了”，要大干一场。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在工作组撤走后，要学生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市中学生的会（江青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亮相）。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里，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我们班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后来回忆，“8月1号从邢台返校，看到对联从楼上挂到楼下，一下子就懵了。在邢台受的是正面教育，现在成了狗崽子。”这样的同学心理就是怕，心惊胆颤，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了。而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学生群体中不同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类学生在打人那天的表现。总的来讲，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马笑冬：当时你们学校谁管事？

叶维丽：勉强称的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它的合法性是工作组建立的，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再加上对联的出现，给它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高干子弟，这时成了血统最高贵的人（虽然它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不是对联的狂热鼓吹者，但当时在客观上是那样一种形势）。在我这样的初中生眼里，它是工作组走后学校唯一的领导机构，但它的地位又是脆弱和不确定的，缺乏权威性，像个留守处或是维持会。

8月4号下午就开始打人了。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有七八个学生冲进胡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打人了，我就是很多年后才听说的。可见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8月4号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与王晶尧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呢，8月4号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西城区委干预，区委不管。晚上回到家里她丈夫见到她的伤势说“怎么打成这样？”胡志涛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工作组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在暴力程度上还能有所约束。工作组走了之后，约束没有了。

马笑冬：你们学校领导都是女的吗？

叶维丽：两位主要领导，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是女的。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不管，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实际上胡志涛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级组织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生命没

有保障了”，但从区委到市委都不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各级机构相当程度的瘫痪，面对突发情况无所作为。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我们知道，8月初党内斗争剧烈，上层在重新洗牌，说是有十级地震也不过分。8月1号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第四天也就是8月4号毛对刘翻脸了，指责刘领导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5号那天毛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全会），同日毛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卞仲耘恰恰在5号被打死。我反复说明的就是八月初的北京，从中央到市区三级，以至我们小小的中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中。卞就死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马笑冬：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

叶维丽：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在8月5号打校领导的那天，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现在就像一顶帽子。一戴上去似乎什么问题都说明了，但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被解释。

打人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和几个同学出去了。工作组撤了后，没人管考勤，纪律不严格了。我后来又回到学校，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一进校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只见她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象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见到我们班有些同学，听她们说是高一的人最先干的。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二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的一幕。胡志涛当天下午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时间大约在2点半左右。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干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想偷偷摸摸，而是希望别人都来看，这种心态值得注意。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

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两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马笑冬：人还有气吗？

叶维丽：据说还有，但是气若游丝了，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不明，同时又说她有外伤。补充一句，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摧残，仅仅捡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就是8月6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的一句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听完广播，我们班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真是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对这静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校领导，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震动不亚于卞死本身，很多年后我脑子里还响起过这句话。

后来我知道了“死了就死了”的出处。卞死后的当晚，我们学校师生代表会的几个负责人去北京饭店，向住在那儿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此事。吴德听到情况后，沉吟了许久才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他讲的大意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就死了，要注意不要外传和扩散。这是当晚见到吴德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第二天早上代表会对卞死亡宣告的说法，是吴德的原话。这个同学说，我们是和平时期长大的，没有见过血和死亡，卞之死对于她是件严重的大事。同时她自己的父亲也在受冲击，因为家里的情况，她对卞有一些同情，加上卞的问题没搞清楚人就死了，是说过不去的。她没想到吴德会这样表态。因为吴德的身份，他的话是有权威的，等于给卞死定了调子。

这位市委领导的态度很值得琢磨。刚才说到8月4、5号那几天，中国上层政治风云突变。吴德本人是中央候补委员，有资格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上层的变化应该有觉察。吴德对卞死的表态，折射出上层政治的突变对他的影响，就像在前一二天市区两级工作人员对胡志涛祈求保护生命的哀告置之不理一样，反映出七月下旬撤工作组以来形势剧烈震荡的后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卞仲耘之死就多了一层含义，就不是一桩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而是与中

国当时政治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我后来问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大家对6号当天广播里的记忆和反应不太一样。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她记得广播里还有一句话，是说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不然就是同样下场。对这句话我毫无印象，别的同学也没印象，但这个同学说她听到了。前一天她是被叫人下去看斗校领导的。她怕血，见血就晕，但她又不敢不看。另外一个同学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她不好。她听到卞仲耘死的消息后，马上想到卞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母亲，要倒霉了。看起来人们的记忆和对事件的反应，和每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反应是如果革命就是暴力，那我当不了革命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这样想，还是因为我有资格革命，而对那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来说，不是当不当革命者的问题，而是再不老实，就是革命的对象了。

卞仲耘，我私下叫她“卞阿姨”。1949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父母认识。但做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的印象，是在1966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欢喜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下来了，22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接着很快就文革了，哪儿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找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过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参观一些教师宿舍，让我们看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家，就是要用这种做法来羞辱老师。到了一位女老师家，她不在，只有保姆抱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我们走在高一那个班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啐那个孩子。我非常反感，心想即使孩子的妈妈十恶不赦，孩子有什么罪？可她们这样做，没人敢说话。卞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有这两个人，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去想，在老师家时众人的沉默实际上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焰。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二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这跟是女学生有关系吗？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女性的残暴”，把性别做为一个因素。有人说女性因为性的压抑更深，所以发泄得更猛烈。我们没有扎实的数据来证明女生比男生狠，我也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当时男生打人也很狠，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

马笑冬：女三中的学生也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很多人确实有女红卫兵特别激烈的印象。不过说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有关系，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我。

叶维丽：我还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施暴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比如红色娘子军，参加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她们革命起来就很坚决。可这个并不适用于好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是娇生惯养的社会宠儿。再说我们在文革前没有亲身经历过暴力。电影上小说里有，但那是敌人对革命者的严刑拷打，是反面的东西。

马笑冬：可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说成是不同的东西，革命暴力是合法的。还有，看一个人首先要分清他是什么阶级。你还记得文革前我们班讨论如果一个人落水了，要不要先搞清楚他是什么阶级吗？到了文革就变成如果一个人是“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侮辱他伤害他都是可以的。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文化。

文革前大批特批温情主义，确实给文革做了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时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得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叶维丽：你要当革命者啊。我觉得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対革命的崇拜。

马笑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维丽：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笑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维丽：对。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豪劣绅，给他们带高帽挂牌子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带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四十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1966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履行这个“仪式”的，还是以红五类、干部子弟为主。想起来真是讽刺，下手打卞、胡的人，当年就坐在台下听胡志涛讲“革命接班人”对革命的特殊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脑子里想了很久，就是有能力施行暴力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马笑冬：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叶维丽：她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施暴？

马笑冬：我想是这个意思。

叶维丽：大概是那天我们班听到卞的死讯后，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我们都吓呆了。那个场面让我觉得，对于暴力大部分人最强烈最直接的感觉是恐惧，能下手打人的是少数。因为恐惧，谁都不敢上去阻拦，这在事实上默许了恶行。

~~~~~

【抗拒遗忘】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 张 敏 •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在2008年9月6日播放的采访报道——编者〕

◇ 8月5日家祭卞仲耘

在8月5日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在文革中最早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学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二周年纪念节目——“抗议与祭奠”。

1966年，卞仲耘是当时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那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这所学校现在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今年8月5日，卞仲耘遇难祭日，卞仲耘的丈夫、八十七岁的王晶尧先生在北京家中，和前来的朋友祭奠了卞仲耘校长。

日前王晶尧先生再次接受我的采访，从今年8月5日的祭奠谈起。

王晶尧先生：“唉！是这样，北京办奥运，交通嘛，一般人很少出来，有朋友来看望，而且献花，照片你们看到了吗？（已上网）”

◇ 王晶尧先生抗议：实验中学校庆宋彬彬成“荣誉校友”

2007年9月9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九十年校庆。12月22日，王晶尧发表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就该校九十年校庆，将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当时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评为九十名“荣誉校友”之一表示抗议。

关于1966年8月18日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事情，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断：

（插播）“＜群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场解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群呼＞‘毛主席万岁！’……＜现场解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晶尧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回顾了卞仲耘校长遇难，以及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官方统计）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公开信要求实验中学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称号，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王晶尧信中表示，等候袁爱俊校长的回音。

◇ 王晶尧先生：对公开信置之不理，袁爱俊成奥运火炬手，不能容忍

王晶尧先生说：“国内外舆论界、文化界对他们这次校庆的作法反应很强烈。我写公开信提

出强烈抗议，现在他们居然置之不理，毫无回音，有关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到现在我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对这样的重要事件应该表态，这就是我在卞仲耘校长惨遭红卫兵杀害的四十二周年，表示我最强烈的抗议。”

王晶尧先生还提到：“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袁爱俊传递火炬，这意思就是说，有关领导对她违抗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的倒行逆施行为，不但不加以干预，还容忍支持她大张旗鼓同党中央决议对抗。不但没加制止，而且在奥运期间反而对她进行张扬，加以鼓励。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准备提出书面意见，向有关方面进行投诉，表示抗议”

◇ 王容芬女士：8月5日这一天不能忘啊！

王晶尧先生还谈到：“王容芬在卞仲耘遇难四十二周年时的文章你看到了吧？”

他这里提到的8月4日王容芬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红八月祭》。

今年1月12日，也就是王晶尧先生发表公开信后二十天，居住在德国的的学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一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题目是《敦促胡锦涛给文革结案，惩处反人类罪犯》，至今也无回音。

现在在德国的学者王容芬四十二年前二十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她给毛泽东写信抗议文革，以后坐牢十二年。

我就《红八月祭》一文和1966年8月5日卞仲耘遇难采访了王容芬女士。

谈到8月5日这个日子，她说：“这一天很自然地蹦到我日历上，这一天不能忘啊！因为这是一个恐怖行动的开头。从这儿以后就刹不住了，加上毛泽东再一‘挥手’，一‘要武’，公安局……那时候公检法还没有倒台，他们统计出来的数字，仅仅一个月时间，死在红卫兵皮带底下的已经是1，772个人了。

所以，这个日子不能忘。不止是纪念遇难的卞仲耘校长一个人，也是纪念1，772个无辜死了的人，纪念在整个文革中遇难的我们的同胞，所以我就写了《红八月祭》，记这个恐怖行动的开头。

更让人悲愤的是，这个恐怖行动到现在没有结个案，没有结个帐，没有个了，而且当年恐怖行动的那些主角，今天还活跃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舞台上。”

◇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校友王友琴的寻访与记录——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师大女附中（高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8月5日前已有暴力事件——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

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 王晶尧先生：预感危险，8月5日早上夫妻握手告别

王晶尧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他说：“当时在共产党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暴行，红卫兵中间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残杀自己的校长。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尧：“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 王晶尧先生：8月5日前后三天，接连死三位同我有关的人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尧：“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集体谋杀》，她出过一本书。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三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三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在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尧：“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我回家（5日）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 王晶尧先生：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尧：“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尧：“我回去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早在学校已经完全被打死了。这个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讲得很具体。”

◇ 林莽先生：听到嚎叫，见游斗被墨汁涂脸的人们

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他说：“我九十二岁了。当时我就是个‘右派’嘛，还在劳动，‘学校专政’二十几年，我被划成‘一类右派’，劳动教养，送到茶淀劳改，饿死过去救转来，这样才回到单位，是作为病号回来的，就在资料室、图书馆。

8月5日那天，听到外面鬼哭一样嚎叫。我一看，外面人排成队，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胡志涛，校领导，其他几个是教务主任，副校长啊，刘致平等人。那个情况实在……我们历史上几千年……今后怎样我很难说，搞成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场面——卞仲耘、胡志涛，她们的脸用墨汁全涂黑了，就看见眼睛和牙齿。嘴巴还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是走资派！我该死，我该斗！……’每个人都这么喊。卞仲耘手上拿着扫地装垃圾的铁簸箕，胡志涛拿着个脸盘，另外还给他们个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断挨打，就是因为要他们声音大些，嚎，喊得不够响就打。他们就拼命鬼一样嚎叫，不停挨打。

这时，其实已经在大操场我没看到的情况下已经批斗过了。批完游斗，游到后面小操场上来。”

◇ 林莽先生：被学生踢打，终于倒下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先生回忆：“打来打去，下午终于倒下的是卞仲耘，因为卞仲耘比较胖一点，打她最厉害。因为她是学校的书记，又是副校长，人都已经倒下了，红卫兵踢她，说‘你装死’，让她起来，当时起不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再踢……

这些红卫兵就在这一、两天之间，变化很大。过去没有哪个穿草绿色军服，还箍了个红卫兵袖章，脚上过去也从来没见过一下都穿那个翻皮军用皮靴。用穿着军靴的脚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后来红卫兵打累了，就改个办法‘劳改’，发现有一堆砖，还有沙，就捉弄他们。让他们把砖搬到这边来，搬完再搬回去，来回折腾。

这时卞仲耘还倒在地上，她稍稍苏醒一点点，还重新慢慢爬起来，她也想来帮助，就走不

动了。这时我就没再看了，因为我还要打扫厕所去，这边情况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扫完厕所，红卫兵又来叫我，这时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跟着她们到了女生宿舍。因为她们让我平时打扫女生宿舍厕所，扫把什么东西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宿舍楼厕所外间是盥洗室，里间是厕所，我到那里发现她们已经把卞仲耘弄到这儿，她没倒下，但也站不住，扶着靠着墙。让我递笤帚给她，让她打扫，她还没接住我递的笤帚，倒下来。一倒下就再也没爬起来。

这时，红卫兵到盥洗室装了一脸盆水，朝她头上泼过去，泼得她一身是水，还不能醒。这时我跑开了，没有心情看一个人受难，我又回去了。”

◇ 林莽先生：目击口吐白沫和死亡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先生说：“没过多久，又来叫我。这次是在女生宿舍楼中间对着操场的门台阶上，已经挪到外面来了，卞仲耘躺在那里，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还没有完全死，她的眼睛还翻动，说不出话了。女红卫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来，放到平板车上。

我就抬，她两脚上的鞋子、裤子都湿透了。

就在我把她两脚刚刚抬起的时候，一抬头，很多女红卫兵、学生都在围观，她们为什么还哈哈大笑？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不是个右派吗？让个活着的‘右派’，抬个快死的‘走资派’，她们觉得好笑。这时我突然感觉耻辱、愤懑、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当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两脚放下来。结果有穿着军靴的脚朝我后腿上猛踢了一下，没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后校工老白他们怎么弄上车去的，抬到后面小操场厕所的门口，有棵树，我还要在厕所干活，才发现卞仲耘在树底下，这时已经完全死了，身上盖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放了个长笤帚，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主持人：“当您看到大字报上压着笤帚的时候，是大概几点钟？”

林莽：“相当晚了，大概三、四点以后。她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 陶洛诵女士：那天特别特别热，他们跪在高台上

现在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原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陶洛诵回忆1966年8月5日下午。她说：“卞仲耘挨打是那天在操场上，天特别热特别热。红卫兵让他们一些人跪在那个高台子上。反正我对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实际是一种抗议。几个红卫兵提着棒子在台子上，后来那些我就知道了。白天看见这一幕，我想‘坏了’，因为我母亲是教师，打人风一开始，回去我跟母亲一说，母亲说‘前景不好’，因为高干子弟他们这种行动，有什么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会，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边的支持和指使的。”

◇ 当年在校一高中学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动了没人管

一位现在在北京已经退休的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说：“那天我到学校去的时候，看到一队红卫兵押着卞仲耘他们几个人，挂着牌子弯着腰，往前走，游街一样的。她们就在后边扔糨糊瓶、炉灰，往他们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里发抖，觉得她们怎么这么狠毒，这样打人，这样折磨人，我心里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是什么坏人。

后来我就和我们出身‘右派’什么的几个人，找了个特别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没人去的地方呆着去了。后来等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操场上没人了，卞仲耘一个人躺在操场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动了，没人管。”

主持人：“那是几点钟？”

答：“记不清楚了，过后听说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么折磨，给折磨死了。”

◇ 王晶尧先生：卞仲耘遍体鳞伤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尧当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医院。

日前王晶尧回忆说：“女附中对面的邮电医院。在场的就是七个人，宋彬彬、刘进……我有名单，这名单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就是当时他们叫什么委员会负责的，掌权嘛。刚一上来，他们很慌张。后来名单是我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的四个孩子也去了，他们让我的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大女儿当时大学一年级，在中国科技大学，二十岁，学校通知我的时候，我们先到医院，后来才通知她从科技大学赶到医院的。二女儿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师大一附中。老四，女儿在师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长那年多大年纪？”

王晶尧：“五十。”

主持人：“您当时见到这几个人，让他们留下了名字，这时候您见到卞校长遗体没有？”

王晶尧：“见到了。”

主持人：“是什么样子？”

王晶尧：“遍体鳞伤，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还睁着的。在殴打过程中，有女生踢她头、身上、手。还有个学生到最后站在她头上。我们看的时候，她的脸上、头部有伤。后来到了医院太平间、脸上就发紫黑色。到了火葬场，9日火化之前，她的脸全部变紫黑色了，那真是惨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为孩子们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儿找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照片上脸盖着布。”

◇ 王晶尧先生：当时买相机拍照，存照片遗物至今

王晶尧先生当时买了照相机，照下了很多照片、连同卞仲耘校长的遗物保存至今。

关于卞仲耘校长死后情况，王晶尧补充说：“到医院以后，看她遗体的时候，她上身的衣服就没法穿了，就给剪开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 王友琴博士：8月5日，非常重要的一天

谈到卞仲耘校长遇难的1966年8月5日，王友琴博士说：“我想，这一天不但对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样大规模暴力事件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是北京第一个发生的红卫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来办公室等等都已经来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饭店，当面向当时北京第二号负责人吴德汇报这个事情。可是没有人来制止这样德暴力行为。

所以在8月17日，北京101中学发生了第二起打死老师的事件。

在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他们有非常著名的谈话，然后她就改了名字叫‘宋要武’。

8月5日这天，在整个暴力迫害中起的作用当然非常明显。毛泽东他了解这些，其实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为在他发动文革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后来8月8日的‘十六条’里边，都讲的非常清楚‘这个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们从北京死亡的人的日期来看就非常明显，‘八·一八’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

比一天增加，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

另外在女附中当时，有二十来个老师和职员在劳改队里，除了被强迫劳动以外，还遭受各种污辱，也包括殴打。比如政治教员杨震，就曾经被打得昏死过去。林莽两次被提审，都是被打、罚跪，在第二次以后，他决定自杀，已经写好自杀的信，贴在墙上，然后他去拉了电灯。可是电灯泡炸了，他没有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活了下来，今天他还能为此历史作证。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这样残酷的事情，就是用一些当时年龄从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的青年，用拳头、棍棒把大概是两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和残忍。”

◇ 王友琴博士：女附中，毛泽东两个女儿的学校

王友琴博士指出：“这个学校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多的干部子弟，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中学的学生（1966年前已经毕业离校）。

特别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时候，学校的干部子弟大概占了百分之五十。我们也看见红卫兵运动就是在这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最早开始形成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见在北京，在北京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师大女附中……这些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地方，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干部子弟。他们有内部的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和方向，他们也以‘革命的主导力量’自居，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没有道歉和忏悔，受难者家人还在恐惧中

王友琴说：“当然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他们中间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谈不上忏悔。

我是想，这已经是四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可是直到现在，这些受难者们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清楚明晰的记载，他们的家人还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很多人还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是应该改变的。”

◇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后——是谴责记载，还是当光荣炫耀？

王友琴表示：“虽然这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来说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不谴责、不记载，那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些东西，而事实上可能有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们，也还抱着这样的看法，所以也才有不久以前，在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校庆的纪念会上，还把宋彬彬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当作学校的光荣来张贴和炫耀。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假如我们现在还认为，杀死校长是一种光荣，那么今天怎么可以有我们现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

## 【往事追忆】

妻子也进了“牛棚”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起来不几天，尹聚平也被军管会隔离审查了。

尽管我后来早已同军管会的同志握手言欢，但我当时骂他们是“法西斯”，实在是事出有因。军管会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怀疑、审查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在还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就把审查对象当敌人对待，采取极不人道的手段对待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妈妈，用对付监狱里犯人的办法进行逼供，这种做法 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据说尹聚平的主要罪状是参与了“7·20”事件、反军乱军、王力的黑秘书等等。这真是抬举了尹聚平。给王力当秘书，本人还差不多，她是不够格的。这个该死的王力，害人不浅，据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据说他是个国民党，据说他反周总理，据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他发明的。因此，在“武汉事件”后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我早就预感到尹聚平等人要受牵连，果然如此。

按说军管会的某些人是见过世面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尹聚平，一个跟着中央代表团出了几天差的青年学生，若怀疑有什么问题，让她交待一下完全可以。要知道，当时王力已被打倒，但谢富治还未打倒。中央至今也没把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定为反革命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当时都活着，武汉“7·20”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清楚。一个小小的学生在中央代表团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从这里抓到什么“大鱼”。后来得知，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其余几个一块赴武汉的北航学生也受过审查，但不过是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上交组织就完了。有的同志很快就解脱了，并入了党，提了干。井冈山、吴介之、胡惠娟三人皆未因“7·20”事件而“获罪”，可是738厂军管会却如临大敌，认为抓大鱼、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738厂工作的男子汉钱植平——为了纪念他，此处用真名，请他的家属理解。

尹聚平的“牛棚”就是我后来的“别墅”。后来我才知道，尹住在这里时远没有我幸运。军代表和女看守们让她住在那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面积一算就知道的阴暗潮湿的小水房里，用木板搭了一个小床，这就是尹聚平的新家。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谢谢军管会的长官们！

军管会专案组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面书生，此人姓梁，外号“凉半截”。在他的指挥下，年轻的、立场坚定的女看守们对尹聚平采取了非常“革命”但极不友好的行动。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文革中，中国大陆的“牛棚”多如牛毛，被关的“牛”们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否定文革后，制造“牛棚”的人大都下了“地狱”。可是，惟独抓“5·16”时制造“牛棚”和虐待“牛”的人们却立了大功，官运亨通，心安理得。这，就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不愿再追述军管会专案人员和女看守们的“革命行动”。我敢保证，他（她）们百分之百是好人。在那个人人发昏的年代里，最最革命的行动就是整人，就是把同类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咬死后连骨头吃掉。

感谢那个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凉半截”前来暂停了对尹聚平的“革命行动”。他说：“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斗室，小小的斗室，从此成了尹聚平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家，家可以关上门来睡觉，这个小小的“家”没有门，里面装上了二百度的电灯泡，“光芒万丈”，“主人”没法睡觉。738厂有的是女工，积极分子们很好找。车轮战术开始了，整天整夜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头几天加起来一共让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就算她是个动物，也需要打个盹儿。可是，只要她的头一垂，立即传来女看守们的拍桌子声和喝斥声。由于挂记家中的老人、儿子，她整天以泪洗面，“废寝忘食”，悲愤欲绝。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也免得受罪了。

经过几天的连续折磨，尹聚平已经面目皆非。她欲哭无泪，呆若木鸡，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她的内分泌已严重失调，脸上、身上长满了水泡，眼球突出，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迅速地消瘦，几天下来，仿佛换了一个人，“苗条”得几乎皮包骨头。当年不兴减肥，否则军管会的逼供专家们发明的这种减肥秘方足可申请国际专利。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大打出手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有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洋鬼子们死到哪里去了。这些该死的帝修反分子，整天游山玩水，不干正事，也不愿到1971年的中国北京738厂来看一看。

天要绝人，没有办法。身居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以及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不可能想到，那个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扎着两条小辫跑来跑去的女学生尹聚平今天不想活了。让她的儿子、丈夫、父母、兄弟姐妹们见鬼去吧！来世再见吧！尹聚平的情绪已经反常，随时可能出事。

还要感谢军管会“凉半截”，一天，他突然交待女看守们，千万提高警惕，一秒钟也不准离开人，不准她手里有硬物和绳子之类，千万不能让她自杀了。

当时尹聚平不知道，同时被关的钱植平同志，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牛棚的厕所里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钱植平是从海军转业到738厂的，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如此而已。

钱植平自杀，救了尹聚平一命。军管会似乎感到人死了倒无所谓，弄不出多少口供和材料，如何论功请赏？如何升官？不行，不能让尹聚平也自杀了。那样传出去，军管会逼死了二条人命，听起来不太好听，人家要骂我军管会是笨蛋，是法西斯。

于是，“凉半截”来到尹聚平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尹聚平，前几天对你的革命行动，你要正确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在你是烈士后代的面子上，今后允许你每天睡一会儿觉。她们不会打你，但你也不要惹她们。你要老实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从此以后，尹聚平的待遇稍好了一点。

钱植平呀钱植平，你用你年轻宝贵的生命，救了尹聚平一条命，我代表全家谢谢你了。愿你的冤魂安息吧！你不该死，你应该活下来，顽强地活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连老婆孩子也不要了？

从此以后，小屋里的小床才真正成了尹聚平的“家”，尹聚平可以坐在上面，晚上可以在上面睡几个小时。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女看守们一怕尹聚平逃跑，二怕尹聚平行凶，逼供完后就把她赶到小屋里。二百度的电灯泡始终“光芒万丈”，七、八只年轻漂亮而又凶狠残暴的大眼睛24小时轮流盯着她。旁边就是一平方米的厕所，大小便必须开着门，漂亮的大眼睛们继续盯着。

尹聚平这时是什么？是人吗？不是，尹聚平现在象只母猴。诸位（包括尹的女看守们）到动物园去过，那些漂亮的孩子妈妈领着孩子在观赏铁笼子里的母猴，多好玩呀！那母猴的儿子被人家枪走了，既不可望又不可及。母猴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谈何容易？老老实实呆着吧，谁让你不是人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